

·专题：研究方法·

政策捕获：方法与探索

□王建刚 杜义飞 谢 瑜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1731]

[摘 要] 政策捕获是评估决策者如何利用可获取的信息来做出判断的方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决策与判断任务的研究,但国内仍然缺乏对政策捕获以及如何实施政策捕获研究的认识。在介绍政策捕获以及如何实施政策捕获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悖论视角,对政策捕获的实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尝试与探索,以促进有效地揭示企业为何以及如何不断地释放潜在。

[关键词] 政策捕获;悖论视角;潜在释放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71/j.1008-8105(2017)02-0032-09

引言

当前许多组织研究从事决策(decision-making)或判断任务(judgment task),也被称为政策捕获(policy capturing),被普遍用来执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1],连接了微观与宏观领域的研究^[2-3],即跨越众多个体而体现在组织层面决策的总体趋势或规律。当前,各个研究领域,如营销、组织行为、战略领域,都已使用政策捕获的方法来理解个体或组织的决策,以及影响企业管理者决策的因素。政策捕获研究的最终目标是确定哪些是影响个体或组织决策的最有影响力的信息或因素^[4]。当前战略管理领域已广泛使用政策捕获的方法,如战略形成^[5-6]、联盟合作伙伴的选择^[7-11]、绩效评估^[12-13]、技术合作^[14]、技术获取^[15]、组织治理模式^[11, 16-17]等。除了战略领域,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也已利用政策捕获的方法来研究个体的决策,如付小费的决策^[18]、薪酬决策^[19-20]、工作选择^[21-22]、工作绩效^[23]、工作场所的性骚扰^[24]等。

政策捕获研究在研究个体或组织的决策或行为尤为具有优势,尽管如此,当前仍然缺乏对政策捕获以及如何实施政策捕获研究的统一认识^[4, 25],尤其是在国内,对政策捕获研究的认识与理解更为有限,运用政策捕获来开展的研究极为有限。本文期

望通过对政策捕获及其如何实施政策捕获研究的介绍,让更多的研究者利用该方法深入对组织决策或行为的研究。同时,通过政策捕获研究,可以为研究者带来一些新的有趣的研究发现,本文将结合悖论视角来深入探讨对政策捕获研究的再认识与理解,并通过政策捕获研究来更有效地解释企业为何以及如何不断地释放潜在。

一、何为政策捕获

政策捕获是评估决策者如何利用可获取的信息来做出判断的方法^[25-26],以推断不同的影响因素对决策者的决策或判断所产生的影响^[27]。该方法的目的是捕获影响决策者评估决策的因素,即决策者如何权衡、组合、整合信息^[26]。具体地,让决策者根据由不同的因素所构建的一系列的情景来做出判断,以响应所需要做出的决策或解决的问题,从而可以让研究者定量地回归分析这些决策结果与影响因素间的关系,进而可以推断出决策者的判断政策^[4, 28]。在政策捕获研究中,可以将决策者的决策结果视为构建一系列情景的影响因素的数学函数^[29],可以解释决策者当前的判断,并帮助决策者预测未来的决策结果。

当然,政策捕获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也存在自身的优势与劣势^[4, 25, 27]。政策捕获的优势在于^[4]:对

[收稿日期] 2017-01-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2131,71672021);中央高校重点资助项目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团队项目(ZYGX2015SKT01);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16ZR0014)。

[作者简介] 王建刚(1984-)男,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杜义飞(1974-)男,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谢瑜(1986-)男,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影响因素系统的抽样，也可以有效地控制混杂效应，排除对结果的竞争性解释。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所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这可以让研究者聚焦于一些特定的因素或因素的组合，从而可以有效地控制其他因素或刺激的影响。Tomassetti等^[30]研究表明，与传统的自我报告的研究工具相比，政策捕获更能够降低社会期望回答（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即给出正向的自我描述的倾向），从而保证了问卷的效度。而政策捕获的劣势主要在于其可能缺乏现实性，这是因为研究者仅仅考察了部分的影响因素，以及一些假设的情景^[12]。换言之，政策捕获研究不能够提供一个与现实情况完全相一致的情景，也不能够把所有的影响因素或信息考虑进所构建的一系列情景。另外，政策捕获研究属于

横截面的研究，无法有效地捕获个体或组织的纵向的决策过程。

尽管政策捕获存在自身的劣势，以及使用过程中的风险，但其优势也让大量的研究者选择该方法，这是与它所研究的问题相关联，如决策者的决策判断，而政策捕获本身就是要捕获影响决策者判断的信息或因素。同时，严格执行政策捕获的程序也可以帮助研究者有效地避免使用政策捕获的危险点^[27]。如在战略管理领域，大量的研究已使用政策捕获的方法来研究企业的战略决策，见表1。

二、如何执行政策捕获

政策捕获是一种准实验的研究方法，Aiman-

表 1 战略管理领域的政策捕获研究

作者	决策情景	样本	情景数量	决策因素	统计分析方法	理论视角	主要的研究发现
Hitt & Middlemist (1979) ^[13]	组织业务单元的有效性	38个管理者	30	25个	线性回归模型、方差分析	组织有效性	测量有效性的标准及其权重在业务单元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组织有效性的完整的决策标准包含生产率与非生产率，政策捕获可以实现组织业务单元间的比较分析
Kachra & White (2008) ^[31]	知识转移	79个研发科学家	8	3个	方差分析	互惠理论	竞争性、社会关系和企业边界共同影响管理者的互惠性预期和知识转移
Wang, Gao, Hodgkinson, Rousseau, & Flood (2015) ^[7]	企业慈善捐赠	376位EMBA、MBA学员	16	13	互动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IGLS)	高阶理论	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压力正向影响捐赠行为；顾客和竞争者对捐赠行为的正向影响降低，而雇员压力负向影响捐赠行为
Tyler & Steensma (1995) ^[14]	技术合作机会	101位企业高管	30	17	逐步回归模型	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期权理论、高阶理论、规范性战略	管理者融入了交易成本理论、期权理论和规范性战略的信息来评估合作性技术开发机会，管理者的认知局限影响其评估
Hitt, Dacin, Levitas, Arregle, & Borza (2000) ^[7]	国际战略联盟合作伙伴选择	85个发达市场企业；97个新兴市场企业	30	14	分层线性模型 (HLM)	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	国际战略联盟的成功，新兴市场企业强调财务资产、技术能力、无形资产、共享技能的意愿；而发达市场企业则强调独特的能力和本地市场知识的获取
Hitt & Tyler (1991) ^[5]	战略并购	65位企业高管	30	15	分层回归模型	理性规范视角、外部控制视角、战略选择视角	战略决策模型是复杂的，根据行业与管理者特征而变化
Ireland, Hitt, Bettis, & De Porras (1987) ^[6]	战略形成过程	12位高管；24位中层；20位基层管理者	30	21	分层回归模型	管理者认知	不同层面的管理者对企业优势与劣势、及其外部环境的感知影响企业战略形成的过程
Tyler & Steensma (1998) ^[9]	潜在的技术联盟形成	91位企业高管	30	17	分层回归模型	认知加工视角	企业高管的技术性的教育经历、对技术的强调，以及过去成功的技术联盟的经验将使企业管理者更多地聚焦于联盟所带来的机会
Hitt, Ahlstrom, Dacin, Levitas, & Svobodina (2004) ^[8]	联盟合作伙伴的选择	63个中国企业，58个俄罗斯企业	30	14	分层线性模型 (HLM)	制度视角、资源基础观	中国企业更关注潜在合作伙伴的无形资产，俄罗斯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具有财务资本和互补能力的合作伙伴
Ahlstrom, Levitas, Hitt, Dacin, & Zhu (2014) ^[10]	战略联盟合作伙伴的选择	192个企业数据	30	14	混合模型 (Mix Model)	制度理论	制度环境的相似性与差异导致企业选择战略合作伙伴的倾向发生变化
Reuer, Tyler, Tong, & Wu (2012) ^[16]	国际合资企业	60位企业管理者	30	16	分层线性模型 (HLM)	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期权理论	企业管理者融合了多种理论视角（即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期权理论）下的信息来评估国际合资企业的机会
Reuer, Tong, Tyler, & Arino (2013) ^[11]	组织治理模式与合作伙伴的选择	90位企业管理者	30	16	似不相关回归 (SUR)	信息经济学视角	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治理决策（国际合资与并购）和合作伙伴的选择来解决国际合资和并购的交易风险
Tong, Reuer, Tyler, & Zhang (2015) ^[17]	内向型FDI下的国际合资与剥离	84位中国企业管理者	30	16	分层线性模型 (HLM)	东道国视角	企业管理者对国际合资与剥离的偏好依赖于跨国企业的资源、潜在的交易风险和现有的纠正机制

(续表)

作者	决策情景	样本	情景数量	决策因素	统计分析方法	理论视角	主要的研究发现
杜义飞等 (2017) ^[15]	后发企业的技术获取	83位MBA学员	30	14	似不相关回归 (SUR)	资源依赖理论、组织双元性视角	后发企业表现出技术购买的主行为倾向和技术模仿的次行为倾向；当顾客需求较强，后发企业更倾向于技术购买；当技术转化能力较强，后发企业更倾向于模仿
何婧 (2014) ^[33]	后发企业的市场导向选择	21位MBA学员	30	14	似不相关回归 (SUR)	资源依赖理论、组织双元性视角	当来自顾客压力较强，后发企业更倾向于反应型市场导向；当研发能力较强，后发企业更愿意选择先动型市场导向；当具有引导、创造顾客需求的能力，后发企业同时偏好于两种类型的市场导向
Du & Wang (2016) ^[34]	后发企业的技术获取	83位MBA学员	30	14	似不相关回归 (SUR)	资源依赖理论、悖论与组织双元性视角、LLL模型	后发企业可以利用自身已具备或可控制的资源、能力来驱动其双元性的构建，实现“由外至内”的逻辑，以及实现从利用到探索

表 2 政策捕获的步骤

研究步骤	涉及的要点	具体说明	代表研究
第1步：研究设计	研究问题的类型	一般针对的问题主要是跨越了许多的决策者而反映出来的总体趋势，而不是反映个体决策的结果	杜义飞等 (2016) 何婧 (2014)
	如何使研究更具代表性和现实性	选择合适的被试者；设计的研究情景应该符合现实生活；正式调查之前先执行预测试，进而调整调查工具	Tyler & Steensma (1995, 1998) Hitt & Tyler (1991)
	情景因素的数量	13-25	Hitt, Dacin, Levitas, Arregle, & Borza (2000)
	决策结果（因变量）的测量	5-9点量表	Hitt, Ahlstrom, Dacin, Levitas, & Svobodina (2004)
	展示情景的方式	一般采用装订好的纸质问卷，但也可以采用音频或视频的呈现方式	Ahlstrom, Levitas, Hitt, Dacin, & Zhu (2014)
	情景的数量	30	
第2步：研究执行	所需样本的数量	100个被试者左右	
	如何收集数据	给予被试者完整的背景说明；让被试者在大约1小时左右填写问卷；执行预测试	Ireland, Hitt, Bettis, & De Porras (1987)
第3步：分析	所选择的统计方法	分层线性模型(HLM)、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UR)等	Reuer, Tyler, Tong, & Wu (2012)
	分类变量的编码	可以采用虚拟变量	Reuer, Tong, Tyler, & Arino (2013)
第4步：解释结果	承认研究并不能包含所有影响决策结果的变量；根据不同的实验设计（即正交设计与非正交设计）		Tong, Reuer, Tyler, & Zhang (2015)
第5步：报告结果	应该详细描述产生情景的过程；描述所选择的被试者，以及分组数据的政策特征		

注：本文总结了政策捕获在宏观的战略研究领域的实施

Smith等提出了执行政策捕获的五个步骤：研究设计、研究执行、分析、结果解释、报告结果^[4]，见表2总结。

（一）研究设计

政策捕获并不是适合于所有类型的问题，而是更适宜于关于个体或组织决策的问题。因而，在政策捕获研究设计中，首先，研究问题的确定。研究者应该明确所要研究的问题及问题的性质，这决定

了后续的数据收集、分析和结果的解释。Aiman-Smith等指出^[4]，政策捕获研究可以捕获两类性质的研究问题：一是关于独特的个体性质问题(idiographic)，检验个体的决策结果；二是关于常规性质的问题(nomothetic)，检验许多决策者的决策所反映出来的一般性或总体性的趋势。第一类性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组织行为的微观研究领域，如Zhou和Martocchio^[20]研究了中国企业管理者的两种薪酬激励决策，他们发现，中国管理者表现出与美国管理者不同的决策结果，中国管理者的奖金激励决策依赖于员工的个人需求，但不强调其工作绩效；而非货币激励决策更多依赖于员工与同事、上级的关系。第二类性质的问题则聚焦于较为宏观的研究领域，如战略管理。杜义飞等^[15]通过调查后发企业管理者的技术获取决策，而发现了后发企业的技术获取的偏好。其次，具有代表性、现实性的实验设计。实验设计的代表性和现实性要求研究者的决策问题是现实存在或发生的，而不是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发生的^[25]。同时，所设置的研究情景也应符合现实情景，尽管研究情景并不能包含所有影响因素，但应该包含那些显著影响决策结果的因素。此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对决策研究也非常重要。如后发企业面临技术与市场的双重劣势，杜义飞等^[15]则开发了后发企业的资源双依赖情景，选择了89位后发企业的管理者，检验了后发企业在这一情景下的技术获取决策，即技术购买还是技术模仿。同样地，Hitt等^[8]研究了转型制度环境下，企业在联盟合作伙伴的选择上如何决策？他们选取了63位中国企业管理者和58位俄罗斯企业管理者，比较了同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中国与俄罗斯企业联盟合作伙伴选择的战略决策。

在具体的实验设计过程中，研究者还需要关注一些关键事项，如情景因素的选择、情景因素间的关系、所设置的情景数量等。

1. 在情景要素的选择上，研究者可以从现有文献、访谈、焦点小组甚至来自新闻媒体的信息来确定情景因素。如杜义飞等^[15]通过与一个典型的后发企业的管理者的访谈，同时结合现有后发企业的技术获取的文献，开发了一个后发企业技术获取的决策情景，所选择的情景因素包括技术、顾客、竞争对手和企业自身能力四个层面，共计14个因素，见表3所示。

表 3 政策捕获研究的情景示例

	情景因素	很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很高
技术层面	1. 新技术的成熟度					√
	2. 新技术的技术难度				√	
	3. 新技术与本企业现有技术的差距		√			
	4. 直接获取新技术的代价			√		
	5. 新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				
顾客层面	6. 顾客对新技术的了解程度	√				
	7. 顾客对新技术的需求强度					√
	8. 顾客与本企业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					√
竞争对手层面	9. 竞争对手现有技术的领先程度					√
	10. 竞争对手获取外部技术的力度					√
企业自身层面	11. 本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		√			
	12. 本企业通过获取外部技术所积累的技术转化能力					√
	13. 本企业的市场开拓与运作能力				√	
	14. 本企业应对竞争的战略整合能力				√	

2. 情景因素的赋值与情景间的独立性。每个情景下的因素的赋值则可以通过重复的随机赋值来实现（从1到5，1代表最低，5代表最高），但应该确保情景间的相关性达到最低，从而避免多重共线性的问题^[8-9]。如Hitt等的研究中的情景中的两两要素间的最高的共同方差为0.13。同时，所有情景因素的方差应该保持相对一致的水平，这可以确保所有因素具有相对等等的概率对决策结果产生影响。Tyler和Steensma的研究中的情景因素间的超过96%的双侧相关系数数值低于0.4^[9]。杜义飞等的研究中双侧 $r < 0.4$ 的数据则达到总数据的97.8%^[15]。这些都表明，情景间的相关性较低，代表了所建构的情景之间具有较大的可区分性，避免了情景间的双重叠。

3. 情景因素的数量。受到全要素设计(full factorial design)的限制^[25]，研究情景无法全部包含所有影响个体或组织决策结果的因素，因而采用部分设计的方式(fractional design)应该是一种更可

行的方法^[35-36]。相比全要素设计方法，部分设计的方法也可以获得与全要素设计方法相同的结果，而同时又能够降低被试者填写问卷的疲累或厌烦^[36]。当前政策捕获研究并未就最低可接受的情景数量达成一致，组织行为领域与战略管理领域在选择情景因素的数量上不同，如组织行为领域的政策捕获研究的情景因素一般5~9个为宜^[4]，而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则一般设置13~21个情景因素，如表1所示。

4. 情景因素间的独立性。考虑情景因素间的相关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研究采用了正交设计，因为这可以产生对回归系数最稳当和明确的估计^[25, 37]。正交设计要求各情景因素之间保持独立性，不存在相关关系。Karren和Barringer在回顾的37篇政策捕获研究中，有22篇采用了正交设计^[25]。尽管如此，要保持研究情景的代表性和现实性，研究者则更倾向于考虑使用非正交设计，即各情景因素间存在相关关系，如Tong等^[17]、Reuer等^[11]的研究。

5. 对于情景数量，Aiman-Smith等建议最好不要超过80个^[4]。Stewart则建议控制在25~40之间^[28]。尽管如此，Karren和Barringer认为，情景数量或问卷长度应根据个体的情况而变化，而预测试可以帮助研究者确定测试者可接受的最大数量的情景个数^[25]。如在战略管理领域，一些学者根据研究问题，并通过预测试而最终确定了30个研究情景，对被试者可能是最合适的^[5, 7-8, 11, 15-16]。

（二）研究执行

研究情景被设计完成之后，研究者可以形成完整的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包括了潜在的情景，这一情景通过不同的决策标准来描述，即解释变量；另外一部分是对决策结果的评估，即被解释变量，见政策捕获的研究情景示例。另一部分为人口统计调查，主要是对企业与个体回答者相关信息的调查。然后，研究者来具体实施数据收集，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应该让被试知悉研究目的，确保被试者理解政策捕获的任务，这可以给予被试者以完整的调查问卷使用说明，如提供给被试者关于研究情景的文本信息，以使被试者能够真正理解所建构的情景。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研究者应确保被试者持续回答完所有的情景，Aiman-Smith等建议，整个数据收集过程持续大约1小时左右^[4]。此外，在正式的调查之前，研究者可以通过预测试来调整问卷。如Hitt等通过预测试可以检验政策捕获工具的效率，即研究情景的感知效度、使用说明是否清晰、变量及其界定是否清晰以及完成

调查所需的时间等,进而可以让研究者可以及时地调整调查工具^[8]。

(三) 分析

问卷数据收集后,研究者可以对数据进行诊断,以评估数据的效度。同时,对问卷中的分类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s)可以进行虚拟变量的编码。大量的统计方法被用来分析收集的数据,最被常用的多重回归方法,如OLS、GLS、logistic回归等^[5,13],除此之外,分层线性模型(HLM)^[7-8, 17]、混合模型^[10]、似不相关回归模型^[11, 15]等。同时,研究者也应该关注不同的回归方法的优势与劣势。如Tong等^[17]使用分层线性模型(HLMs)作为统计方法,这是因为其收集的数据是多层面的,具有嵌套的性质。由于每个被试者的30个观察值并不是独立的,同时需要检验情景变量对两种不同的决策结果间差异的影响,Reuer等^[11]、杜义飞等^[15]采用了似不相关回归模型。

(四) 解释结果

Aiman-Smith等指出^[4],对于回归结果的解释,首先,研究者应承认,研究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影响决策结果的变量。其次,研究者应该将对分析结果匹配所研究的问题。回归结果对不同类型的研究问题的理解是不同的,如对于独特的个体性质问题(idiographic),回归结果可以帮助研究者有效地理解个体的决策过程。对于常规性质的问题(nomothetic),研究者可以从回归结果来理解跨越所有个体决策者所体现出来的总体趋势。如杜义飞等^[15]通过对后发企业管理者的技术获取偏好的调查,发现,后发企业表现出技术购买的主行为倾向和技术模仿的次行为倾向;在技术购买与技术模仿的权衡中,当顾客需求较强时,后发企业更倾向于技术购买;当后发企业本身的技术转化能力较强时,后发企业更倾向于技术模仿。

(五) 报告结果

遵循Aiman-Smith等^[4]和Cooksey^[35]的建议,报告一个完整的政策捕获研究,需要包括足够详细的信息,以使读者能够理解研究的背景和过程,也能够让读者复制研究。具体地,应该详细描述产生情景的过程;描述所选择的情景因素和决策结果,以及对它们的测量以及相关关系等;描述所选择的被试者,包括被试者对所实施的判断任务的熟悉程度等。

在政策捕获研究中,理论视角(theoretical perspectives)成为研究者建构情景的重要来源,正如前文所述,所建构的情景无法包含所有影响决策

结果的因素或变量。因而,研究者所选取的理论视角成为情景构建的关键,指引研究者在特定的理论视角下识别出对决策结果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或变量。如Reuer等在检验中国企业管理者对国际合资的评估中,采用了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和实物期权理论四个理论视角而构建了研究情景^[16]。

在战略管理领域,政策捕获方法被广泛用来研究合作伙伴选择^[7-8, 10]、组织治理模式^[11, 17]、知识获取模式^[15]、市场导向^[33]等的研究。这些研究考虑了在不同样本之间、不同的决策结果之间的比较,从而可以揭示不同的决策者的偏好的差异,如表4所示。

表 4 政策捕获中的比较研究

不同样本间的比较	两种决策结果间的比较
Hiit等(2000): 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新兴市场企业更强调合作伙伴的财务资产、无形资产、技术能力和共享专业知识的意愿;而发达市场企业更强调合作伙伴的独特的能力、本地市场知识	Reuer等(2013): 当企业的产品-市场重叠、对中国企业资源的熟悉程度、较高,企业更偏好于并购;当企业无形资产难以评估程度较高,企业更偏好于合资
Hiit等(2004): 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处于稳定和支持性的制度环境的中国企业更强调合作伙伴的无形资产、技术与管理能力;处于更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下的俄罗斯企业更强调合作伙伴的财务资本、互补能力	Tong等(2015): 企业的技术能力、独特的能力、良好的合作历史、企业难以评估的无形资产、其他投资机会的数量使其更偏好于国际合资;而产品-市场重叠程度让企业更偏好于剥离
Ahlstrom等(2014): 在选择合作伙伴时,相比香港企业,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企业更强调财务资产、无形资产、技术能力;与大陆企业相比,中国台湾企业更强调伙伴获取技能的能力	杜义飞等(2016): 当顾客需求较强,后发企业更倾向于技术购买;当技术转化能力较强,后发企业更倾向于技术模仿

三、一些新的尝试与探索

政策捕获研究比较能够揭示出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如Du和Wang^[34]在研究后发企业的技术获取决策时,通过构建资源依赖的情景,揭示出了后发企业在现有的两种技术获取决策之外的第三种技术获取决策,即当后发企业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时,它们既不倾向于技术购买,也不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与不愿意技术模仿(NOT imitation)相比,较强的研发能力可以使后发企业更倾向于不去技术购买(NOT purchase),这又揭示了后发企业潜在的释放,即突破了原有情景而呈现出的原有决策结果之外的一种存在。悖论视角下,后发企业可以建立并利用组织二元性,如当面临国内顾客需求的压力以及具备吸收能力时,后发企业可以同时倾向于技术购买与技术模仿。可见,悖论视角下,政策捕获可以帮助研究者更有效地揭示企业的双元行为以及企业如何释放潜在。

随着外部环境变得日益动态与复杂,企业也日益出现悖论的感知^[38],悖论视角作为元理论视角^[39-40],要求企业能够应对悖论,即矛盾但又相互关联的要素,它们是随着时间持续存在的^[41-42]。悖论给企业带来的持续的活性,而企业也要承载悖论的活跃,从而可以持续地促进企业的适应系统与存在系统形成良性循环,进而又可以促进企业潜在的释放。如企业可以在适应系统与存在系统(即企业的动态能力)之间形成动态的循环互动^[43-44]。

政策捕获研究可以揭示企业如何在一定的情景下对两种矛盾的决策结果进行选择,悖论视角为应对这些矛盾的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洞见,也为企业涌现意想不到的方式或模式提供了可能,这又是企业潜在的释放,也即企业在突破原有情景而涌现出的新的存在方式或模式。结合悖论视角,本文尝试将悖论视角融入政策捕获研究之中,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发挥政策捕获的优势。首先,在确定研究问题的同时,研究者也将明确具体的决策结果,也即因变量。悖论视角下,我们可以确定两种矛盾但又互补的决策,以研究企业如何平衡这些矛盾但又互补的决策。如杜义飞等^[15]在其研究中确定了后发企业的两种类型的技术获取决策:技术购买与技术模仿。他们发现,国内顾客需求与后发企业的吸收能力都使其同时偏好于这两种决策。正如前文所述,悖论视角可以使企业同时应对对立但又相互关联的要素或方面,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悖论形式^[39, 45],如探索与利用^[46]、稳定与变革^[47-48]、诱导式战略与自主式战略^[49]等,这也给政策捕获的研究者提供了这样既矛盾但又互补的决策的来源。反过来,决策结果的选择与确定又决定了情景的建构,

其次,悖论视角也给政策捕获研究的情景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洞见。悖论视角强调整体性原则^[39, 42, 50-51],而政策捕获所建构的情景也应该遵循整体性原则。研究者通过文献、访谈等途径而选择的因素应该能够共同建构一个不同的因素间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整体性情景,而不是离散的结构,这样一个整体性情景可以让被试者映射到自身所在的企业,进而据此做出判断。如杜义飞等^[15]建构了后发企业技术获取的资源双依赖的情景,即在技术上依赖于领先企业,市场上受到顾客的压力的情景下,后发企业如何在技术购买与技术模仿上进行决策。此外,在选择情景因素的过程中,研究者也需要重点考虑在所选择的理论视角下哪些因素更可能同时对两种矛盾但又互补的决策产生相同的影响?选择这样的因素可以进一步允许研究者在两种类型

的决策间进行比较,如杜义飞等发现^[15],国内顾客需求与吸收能力使后发企业同时倾向于选择技术购买与技术模仿,尽管如此,与技术模仿相比,国内顾客需求使后发企业更倾向于技术购买;与技术购买相比,吸收能力使后发企业更倾向于技术模仿。

对悖论的响应可以为企业带来卓越绩效、可持续性和动态性^[39-40, 42, 52],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企业越来越感知并遭遇悖论式冲突,要求企业能够持续的适应,通过自身的适应系统来持续地承载、释放悖论的活性。可见,外部不确定性是企业保持悖论持续活跃的重要动因。在政策捕获研究的情景建构过程中,研究者也需要考虑如何保持所建构情景的模糊性,从而使情景具有活性,以及哪些因素可以被用来建构并体现情景的这种动态性与活性,从而使企业对立又互补的决策间的悖论持续活跃,进而更有助于揭示企业如何释放潜在。情景的模糊性给被试者的认知带来挑战,但也可以让被试者建立悖论式的认知框架^[53-55],进而具备悖论式思维(paradoxical thinking)^[56-57]或二元思维的能力^[58],可以帮助被试者在情景中做出矛盾的决策,从而可以让研究者从被试者的矛盾的决策中发现一致性的规律。如杜义飞等发现^[15],当具备较高的研发能力时,与不选择技术模仿相比,后发企业更愿意选择不去技术购买,这可能隐含了后发企业更愿意通过自身的研发而创造新知识,而不是通过技术购买或技术模仿而从外部获取知识,这也是后发企业潜在的释放。他们的研究也表明,悖论视角下的情景建构也需要考虑如何保持情景的存在活性,也即情景并不是把管理者的感知框定在特定的框架之下,而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从而确保情景活性的存在,可以帮助管理者突破原有的情景或场景而做出超越现有决策范围的行为选择,这又反映了企业潜在的释放。

四、结论

本文回顾了政策捕获研究的五个步骤,即研究设计、研究执行、分析、结果解释、报告结果,以及每个步骤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关键事项,以帮助研究者更有效地实施政策捕获研究。在此基础上,基于悖论视角,本文对政策捕获研究中的研究问题的确定(即决策结果的选择)、情景建构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与探索。在决策结果的确定上,尝试选择既矛盾但又互补的两种类型的决策;在情景建构上,应该保持情景的整体性、模糊性,从而保持所

建构情景的活性。基于悖论视角下的探索, 本文期望能够通过政策捕获研究的探索而更有助于解释企业为何以及如何释放潜在。

参考文献

- [1] AGUINIS H, PIERCE C A, BOSCO F A, et al. First Decade of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trends in design, measurement, and data-Analysis topics[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9, 12(1): 69-112.
- [2] AGUINIS H, BOYD B K, PIERCE C A, et al. Walking new avenues in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ies: Bridging micro and macro domai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2): 395-403.
- [3] PRIEM R L, WALTERS B A, LI S. Decisions, decisions! How judgment policy studies can integrate macro and micro domains in management research[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2): 553-580.
- [4] AIMAN-SMITH L, SCULLEN S E, BARR S H. Conducting studies of decision making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A tutorial for policy-capturing and other regression-based techniques[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2, 5(4): 388-414.
- [5] HITT M A, TYLER B B. Strategic decision models: Integrat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12(5): 327-351.
- [6] IRELAND R D, HITT M A, BETTIS R A, et al. Strategy formulation processes: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of strength and weaknesses indicators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by managerial level[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7, 8(5): 469-485.
- [7] HITT M A, DACIN M T, LEVITAS E, et al. Partner selection in emerging and developed market contexts: Resource-based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erspectiv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3): 449-467.
- [8] HITT M A, AHLSTROM D, DACIN M T, et al. The institutional effects on strategic alliance partner selec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China vs. Russia[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15(2): 173-185.
- [9] TYLER B B, STEENSMA H K. The effects of executives'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n their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technological allian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19(10): 939-965.
- [10] AHLSTROM D, LEVITAS E, HITT M A, et al. The three faces of China: Strategic alliance partner selection in three ethnic Chinese economie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4, 49(4): 572-585.
- [11] REUER J J, TONG T W, TYLER B B, et al. Executive preferences for governance modes and exchange partners: An information economics perspectiv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4(9): 1104-1122.
- [12] GIBSON C J, HOBSON F W. Policy capturing a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appraisal: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3, 8(4): 640-649.
- [13] HITT M A, MIDDLEMIST R D. A methodology to develop the criteria and criteria weightings for assessing subunit effectiveness in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79, 22(2): 356-374.
- [14] TYLER B B, STEENSMA H K. Evaluating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opportunities: A cognitive modeling perspectiv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16(S1): 43-70.
- [15] 杜义飞, 王建刚, 杨振华. 资源双依赖下后发企业技术获取行为: 购买还是模仿?[C]. 北京: 第七届中国战略管理学者论坛, 2014.
- [16] REUER J J, TYLER B B, TONG T W, et al. Executives' Assessments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A Multi -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2, 8(2): 311-340.
- [17] TONG T W, REUER J J, TYLER B B, et al. Host country executives' assessments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nd divestiture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2): 254-275.
- [18] ROGELBERG S G, PLOYHART R E, BALZER W K, et al. Using policy capturing to examine tipping decisions1[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9(12): 2567-2590.
- [19] SHERER P D. Managerial Salary-Raise Decisions: A Policy-Capturing Approach[J]. *Personnel Psychology*, 1987, 40(1): 27-38.
- [20] ZHOU J, MARTOCCHIO J J. Chinese and American managers' compensation award decisions: A comparative policy-capturing study[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1, 54(1): 115-145.
- [21] BRETZ R D, JUDGE T A. 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 systems in job applicant decision process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4, 20(3): 531-551.
- [22] SLAUGHTER J E, RICHARD E M, MARTIN J H. Comparing the efficacy of policy-capturing weights and direct estimates for predicting job choice[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6, 9(3): 285-314.
- [23] SPENCE J R, KEEPING L M. The impact of non-performance information on ratings of job performance: A policy-capturing approach[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0, 31(4): 587-608.
- [24] YORK K M. Defining sexual harassment in workplaces: A policy-capturing approa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32(4): 830-850.
- [25] KARREN R J, BARRINGER M W.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policy-capturing methodology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2, 5(4): 337-361.

[26] ZEDECK S.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an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otivation[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977, 18(1): 47-77.

[27] ROEHLING M V. "Extracting" policy from judicial opinions: The dangers of policy capturing in a field setting[J]. *Personnel Psychology*, 1993, 46(3): 477-502.

[28] STEWART T R. Judgment analysis: procedures[M]// Brehmer B, Joyce C R B. *Human judgement: The SJT view*. Amsterdam: North-Holland Elsevier, 1988.

[29] CARROLL J S, JOHNSON E J. Decision research: A field guide[M].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0.

[30] TOMASSETTI A J, DALAL R S, KAPLAN S A. Is policy capturing really more resistant than traditional self-report techniques to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16, 19(2): 255-285.

[31] WANG S, GAO Y, HODGKINSON G P, et al. 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CSR decision making: A policy-capturing study of charitable donation decisions in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128(3): 665-683.

[32] KACHRA A, WHITE R E. Know-how transfer: The role of social, economic/competitive, and firm boundary factor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29(4): 425-445.

[33] 何婧. 基于行为倾向与过程分析的后发企业市场导向研究[D].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2014.

[34] DU Y F, WANG J G. From leverage to learning latecomers' trade-offs between purchase and imitation[C]. SMS Special Conference in Hong Kong, 2016.

[35] COOKSEY R. Judgment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96.

[36] GRAHAM M E, CABLE D M. Consideration of the incomplete block design for policy-capturing research[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1, 4(1): 26-45.

[37] NETER J, KUTNER M H, NACHTSHEIM C J, et al. *Applied linear statistical models: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experimental design*[M]. Homewood, IL: Irwin, 1996.

[38] QUINN R E, CAMERON K S. Paradox and transformation: Toward a theory of change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M]. Cambridge, MA: Ballinger, 1988.

[39] SCHAD J, LEWIS M W, RAISCH S, et al. Paradox research in management science: Looking back to move forward[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6, 10(1): 5-64.

[40] LEWIS M W, SMITH W K. Paradox as a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harpening the focus and widening the scope[J].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014, 50(2): 127-149.

[41] LEWIS M W. Exploring paradox: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guid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4): 760-776.

[42] SMITH W K, LEWIS M W. Toward a theory of paradox: A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of organiz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2): 381-403.

[43] 王建刚, 杜义飞, 张均强. “由外至内”与“由内至外”: 以互联网企业反脆弱成长为例[C]. 北京: 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6), 2016.

[44] BIRKINSHAW J, ZIMMERMANN A, RAISCH S. How do firms adapt to discontinuous change? bridging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ambidexterity perspectives[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16, 58(3): 36-58.

[45] RAISCH S, BIRKINSHAW J.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Antecedents, Outcomes, and Moderator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34(3): 375-409.

[46] LAVIE D, STETTNER U, TUSHMAN M 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within and across organization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0, 4(1): 109-155.

[47] FARJOUN M. Beyond dualism: Stability and change as a dual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0, 35(2): 202-225.

[48] POOLE M S, VAN DE VEN A H. Using paradox to build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theori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562-578.

[49] BURGELMAN R A, GROVE A S. Let chaos reign, then rein in chaos – repeatedly: Managing strategic dynamics for corporate longevit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10): 965-979.

[50] LI P P. Towards a geocentric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form: A holistic, dynamic and paradoxical approach[J]. *Organization Studies*, 1998, 19(5): 829-861.

[51] LI P P.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indigenous research: The geocentric implications of Yin-Yang balance[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29(4): 849-872.

[52] PUTNAM L L, FAIRHURST G T, BANGHART S. Contradictions, dialectics, and paradoxes in organizations: A constitutive approach[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6, 10(1): 65-171.

[53] LÜSCHER L S, LEWIS M W.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managerial sensemaking: Working through paradox[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51(2): 221-240.

[54] SMITH W K, TUSHMAN M L. Managing strategic contradictions: A top management model for managing innovation stream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5, 16(5): 522-536.

[55] HAHN T, PREUSS L, PINKSE J, et al. Cognitive frames i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Managerial sensemaking with paradoxical and business case fram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4, 39(4): 463-487.

[56] MIRON-SPEKTOR E, GINO F, ARGOTE L. Paradoxical frames and creative sparks: Enhancing individual creativity through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1, 116(2): 229-240.

[57] INGRAM A, LEWIS M W, BARTON S L, et al.

Paradoxes and innovation in family firms: The role of paradoxical thinking[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6, 40(1): 161-176.

[58] LUO Y, RUI H. An ambidexterity perspective towar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09, 23(4): 49-70.

Policy Capturing Methods and Its Exploration

WANG Jian-gang DU Yi-fei XIE Y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Policy capturing is a method employed by researchers to assess how decision makers use available information to make judgment, which has been employed extensively in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judgment tasks. However, there ar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policy capturing and how to implement it in the domestic research. This paper introduces policy capturing and the five steps in a policy-capturing study,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contribute to some new insights to policy capturing from a paradox perspective, and explore new practices in policy capturing, to reveal why and how organizations release potential.

Key words policy capturing; a paradox perspective; potential releasing

编辑 何婧

(上接第23页)

Event-Path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Paradox and Existentialism

DU Yi-fei PAN Qiong WANG Jian-gang LI Rong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and variety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makes organization face the more uncertainty and contradiction. Why and how can things release the potential under dynamic complex cond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discover a more suitable method to carry out these researches. In our view, the contradiction persist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and the events constitute the process and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We continuously explore an event path analysis method. It takes overall events as a clue, carrying on the overall analysis of dimensions including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event, thereby rendering the process path to find the latent process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paradox; existentialism; event path analysis; latent process

编辑 何婧